

文化研究对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挑战与重构

颜桂堤

内容提要 文化研究对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是挑战又是拓展。中国当代学者的诸种观点、思想与方法汇聚其中，形成积极的肯定性接受、激进批判、策略性接受、否定性批判以及注重挖掘文化研究阐释“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等五种代表性观点。文化研究带来新的突破与拓展，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对文学批评领域敞开了新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则从性别、民族、媒介等向度开启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崭新视域。文化研究为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提供了四个方面的价值：一是激活中国文论的危机意识，二是提升文学理论的实践品格，三是直面“中国经验”，四是坚持“历史化”思维。

关键词 文化研究；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国经验

—

文化研究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迄今依然是当代学界最有活力的文化思潮之一。对文化研究起源的寻找是“令人着迷的但又是虚幻的”，正如霍尔所言：“严肃的、富有批判性的学术工作既没有‘绝对的开端’，也鲜有完整的连续性。”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问题架构”，是“有重大意义的断裂”：“那些陈旧的思路在这里被打断，那些陈旧的思想格局被替代，围绕一套不同的前提和主题，新旧两方面的各种因素被重新组合起来。”^[1]它的兴起有着多重“血统”，其先驱包括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分析学派、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等。文化研究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型构，它是由诸多不同的立场和方法建构的，并且在争论过程之中形成了“理论的喧闹”。霍尔曾生动地将文化研究的构型比作一把伞，而诸如种族意识形态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流行大众文化批评及女权主义批评等则构成这把伞的骨架。文化研究追求的是对理论的灵活运用，众多理论提供的只是背景、方法与

视域。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从“葛兰西转向”到“后现代转向”，文化研究的多次范式转换亦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当代社会历史结构内部意味深长的转向。不言而喻，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与传统文学研究全然不同的学术视野。

首先，文化研究的崛起与欧洲当时的各种社会文化危机有着密切关联。它的崛起深深植根于英国“新左派”政治之中。“新左派”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产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因此必须重新分析新形式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消费方式、社会阶级以及由此产生新的社会认知。文化研究的崛起可谓当时英国社会客观条件的召唤，是社会的变迁在文化场域中的论述呈现。“‘文化’一词发展记录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这些变革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文化”本身就被看作是“一幅特殊的地图”^[2]，这有助于对种种历史变革的本质进行探索。显然，在面对社会剧变的浪潮中，“文化研究”成为重新提出新论题及认识新世界的一种新范式。文化研究的兴起还与英国成人教育密切相关，如汤姆·斯蒂尔所言，“从独立的工人教育运动的余烬中出现了文化研究的凤凰”^[3]。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研究是

一项为了工人阶级成人的大众教育而进行的事业。

其次，文化研究“取决于自身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将文化研究称之为“后学科”^[4]。霍尔将文化研究的优势归结于其“跨学科研究的焦点”，特纳异曲同工地指出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源自于对既有学科的挑战”。文化研究不仅改写了传统学术的“中心/边缘”观念，而且对传统的学科理念和学科建制构成了强烈冲击。文化研究擅长将问题置于多重谱系之间加以考察，试图全面地打开视野，时常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文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符号学或传播学、精神分析学等领域。尽管这种多学科的接合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与博弈，但是它们的汇合无疑已使文化研究产生了丰富且深刻的成果。

再次，文化研究的崛起与现代社会大量密集的符号生产有密切关系。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了一个符号帝国。我们生活在符号的包围之中，符号就是世界。从结绳记事、竹简帛书到活字印刷术，从纸质媒介到互联网、自媒体，符号的传播体系随着技术革新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现今，大数据、云计算、云支付以及智能终端的普及化使得符号更为全面立体地编织我们的生活，成为当代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系列新型的主题渐次浮现，而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意境”“灵韵”“典型”“形象”等基本概念在互联网的符号空间中遭遇了全面颠覆。文化研究有时甚至将整个世界当作一个符号或一个文本来加以考察。事实上，文化研究擅长的就是遨游于“符号帝国”之中，分析并解码符号背后隐含着的复杂关系。

现今，文化研究已经渗透到学术话语的各个层面，“从人文、艺术学科到社会与自然科学。尽管这一概念仍然存在高度争议，其复杂交织的发展历史却引导着学者和其他评论家通过一个认知、批判和审美诸多可能性并存的矩阵”^[5]。从文化研究的理论分析到批判性实践，从文本分析到民族志研究方法，文化研究的“文化”概念确实提供了一种宝贵的理论武库。不管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

究，还是法国罗兰·巴特的流行体系的符号解读，亦或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批评，都致力于阐明文化应当如何在与经济、政治的关联中得到阐释与说明。经过葛兰西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福柯的“知识/权力”等思想的洗礼，文化研究更为自觉地关注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并将其运用到各个研究领域。

文化研究力图以持续、开放的姿态介入到活生生的现实场域，对特定情境加以回应，不断重新阐发、塑形与接合。“文化研究审视特定实践如何置于，以及它们的生产性如何决定于社会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现实体验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前的后现代研究与文化研究发生了交叉；这并不是要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政治和理论主张，而是要注意它对当代文化和历史生活性质的描述。”^[6]这就促使文化研究不仅去关注那些影响特定社会结构的社会、政治、历史与文化等因素，而且也关心具体生活对这些因素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文化研究关注的对象除了被奉为经典的精品之作，它还囊括被其他文化定义所排斥的领域，诸如日常生活方式、生产机制、家庭结构、文化机制等。文化研究不仅要媒体产品进行文本分析，而且应该透视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机制，发现文本背后隐藏的运作机制。文化研究不仅以描述、解释当代文化与社会实践为目的，而且也以改变、转化现存权力结构为目的。

二

萨义德在其享誉盛名的《旅行中的理论》一文中论道，各种观念和理论就如同人之间的交往一样，也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当某一种理论从一地 toward 另一地运动，从一种文化跨越到另一种文化的过程时，它的阐释力是增强抑或减弱，甚或可能因为场域的变迁产生了新变异，这些情形的探讨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兴趣盎然的题目。萨义德认为，任何理论或者观念的旅行方式都需要经历四个步骤：“第一，需要有一个源点或类似源点的东西，即观念赖以在其中生发并进入话语的一系列发轫的境况。第二，当观念从以前某一点移向它将在其中重新凸显的另一时空时，需要有一段横

向距离，一条穿过形形色色语境压力的途径。第三，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姑且可以把他们称之为接受条件，或者，作为接受的必然部分，把它们称之为各种抵抗条件——然后，这一系列条件再去面对这种移植过来的理论或观念，使之可能引进或者得到容忍，而无论它看起来可能多么地不相容。第四，现在全部（或者部分）得到容纳（或者融合）的观念，就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由它的新用途、新位置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了。”^[7]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必然也逃脱不开这些步骤，面对当前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华丽转身及其崭新的学术面貌，我们更有必要追问与反思萨义德提出的关于理论旅行的后两个步骤：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具备了哪些文化研究的接受条件？为何文化研究会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新的学术景观？在中国这一新时空之中，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新用途、新位置发生了哪些改变？它是如何创生发展的？文化研究的中国道路带给了我们怎样的思考？

首先，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使中国现实发生巨大变化与分化，而人文社会科学界对这一重大历史转型所产生的新变化和新现象在认识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一部分人乐观地欢呼，中国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时代，急需引入文化研究来确认这一新现实；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当时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负面现象满怀忧虑，并且批判性地反思“中国正在向何处去”“未来的出路在哪里”等问题他们更倾向于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现象，而且试图通过开展文化研究，获得对社会转型理解与阐释。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转型浪潮中，文化研究进入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并通过借用“文化研究”之名来为自己的批判性分析命名。

其次，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的崛起，许多长期被压抑的矛盾渐次浮出历史地表。诸如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学术与日常生活、激进与保守、人文精神与商品化逻辑，等等，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面貌以及话语变迁史。“人文精神大讨论”“纯文学”“现代性问题”等一系列论争，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思想观念上的冲突，而文化研究所具有的批判精

神恰恰与当时的时代氛围不谋而合了。

再次，是文化研究契合了90年代中国学术体制运转与研究范式转换的需要。作为一门“显学”，对于90年代的中国而言，文化研究具有巨大吸引力。“无论对于学院知识生产，还是对于谋取话语权的学术政治，它都显得非常重要，成为关注、引进和模仿的对象。”^[8]同时，崭新的社会生活呼唤新的理论范式来加以有效阐释，因为传统的研究范式已无法全面有效阐释新的现象。许多迹象表明，文化研究在更为广泛的语境中对现代性的思考与行动，有助于拓展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空间。

复次，是中国大众传媒的兴起与飞速发展对于文化研究的引入与接受至关重要。英国文化研究的崛起本身与现代社会大量密集的符号生产关系密切，90年代中国大众传媒的兴起同样为文化研究创造了一个重要的符号阐释领域。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播平台，更是一个符号与权力角逐的重要场域。中国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及广阔空间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用武之地。

最后，是文化研究在90年代进入中国刚好契合了当时知识分子回应、参与新的社会现实的需求。如戴锦华所述，“文化研究的兴起，不仅是对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回应，而且是对激变中的社会现实的回应与对新的社会实践可能的探寻；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时尚的到来，或始自80年代的西方理论思潮的引入及其本土批评实践的又一浪，而且是直面本土的社会现实，寻找并积蓄新的思想资源的又一次尝试和努力”^[9]。人们迫切想通过文化研究来阐释、剖析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复杂性与独特经验。可以说，文化研究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转型所做出的一种学术选择、一种新的尝试。

文化研究在西方显现的是西方问题史的结构，当其理论旅行到中国并介入到本土问题之中，便进入了另一个阐释结构——“中国问题”。南帆指出：“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经验似乎不是纵向的线性延长，而是不断地扩张、叠加、膨胀、交织成为一个意象密集、内涵庞杂的空间。”^[10]在这一独特空间中，文化研究要成功爆发出其阐释力，至关重要的一环

是“历史结构的转换”。从某种意义而言，结构的转换意味着理论引渡与本土化接合实践的可能。随着历史结构的转换，文化研究在中国已并非仅是作为西方理论旅行的注脚，而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经验”的有效聚焦与表达。

如果说，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更多的只是理论译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与理论资源；那么，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研究者更强调将文化研究作为理论工具来研究中国问题。从1994年《读书》发表李欧梵的访谈《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开始，文化研究在中国逐渐从理论旅行走向了本土化实践，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从游离于学院体制迈向了学科化建制。“文化研究学院化的走向，应该是意味着更为精准的、有批判距离的掌握社会脉动，能够提出更为深刻的分析，才能逐渐累积、建立起批判思维的进步学术传统。”^[11]文化研究开辟了自己相对稳定的学术阵地，相继创办了《文化研究》《热风学术》两个刊物。经过不懈的理论探索与批判实践，文化研究在中国已经形成影响广泛且深刻的人文思潮，渗透到文学、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领域，呈现出充满思想活力的开放性态势。目前，中国文化研究的创生性发展已经开启了国际交流与对话，西方一大批炙手可热的理论家如詹姆斯、大卫·哈维、格罗斯伯格、齐泽克、托尼·本尼特、莫利等纷纷访华，打开了文化研究交流与对话的新局面。

三

近30年来，文化研究深刻地卷入中国的社会历史，有效介入了中国本土问题脉络之中。诸多学者的观点、思想与方法汇聚在文化研究这一论述空间中相互对话与质疑，形成了对“中国问题”多角度的阐释。进入文化研究的中国接受现场，直面文化研究诸种差异性接受的立场与观点，既可以深刻体察中国学者在面对文化研究挑战与博弈的诸般反应，同时也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文思想的发展状况。通过梳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于文化研究的立场与观点，我们可以大致图绘出五

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的积极译介与肯定性接受。这一观点主要以王逢振、罗钢、刘象愚、黄卓越、汪民安、陆扬、王晓路等人为代表，他们对文化研究进行积极肯定并全力引介，翻译出版了雷蒙·威廉斯、汤普森、萨义德、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本尼特、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安德森、詹姆斯等思想家的主要论著^[12]。同时，他们通过对西方文化研究的阐释与研究，为中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繁盛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与理论资源。

第二种代表性观点，是以王晓明、戴锦华、李陀等人为代表的对大众文化的激进批判。在他们看来，90年代文化研究之所以在中国崛起，是与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异军突起的大众文化参与了作为社会转型观念基础的“新意识形态”的建构，而这种“新意识形态”无疑遮蔽了现实的复杂性与差异性。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是文化研究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进行文化研究本土实践的第一批代表性著作。在《在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一书之中，王晓明敏锐地将当时诸如“进步”“现代化”“成功”“消费社会”等一系列话语混合而成的“新思想”称之为“新意识形态”^[13]。他认为，文化研究要批判的正是这种“新意识形态”，尤其要反省知识界对这种“新意识形态”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参与和共谋。不过，王晓明对于“新意识形态”的复杂结构与生产机制还有待于更进一步深入揭示的空间。从其后由“新意识形态”批判大步迈向对“新富人”“成功人士”形象以及对房地产广告的批判，我们可以发现他更多地以感性批判替代了对中国问题复杂性的理性分析。在这套丛书中，戴锦华与王晓明的批判立场相近，也认为大众文化对现实产生了压抑与遮蔽——“迷人的消费主义风景线，遮蔽了急剧的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社会再度分化的沉重现实。”^[14]她通过借助福柯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的方法，力图在历史维度之中揭示“被遮蔽”的东西。在她看来，90年代的大众媒介是对重组中的阶级现实的遮蔽。而每一次遮蔽的“合法化”都是由一整套的社会修辞与文化逻辑建构而成的。因

此，文化研究的批判意义在于：一方面要揭示出在社会意识形态话语转换与重构过程中发生的遗忘、压抑与遮蔽，另一方面要揭示出知识分子参与这种话语转换从而获得话语/文化权力的隐蔽机制。诚然，这样的反思是深刻的，但事实上，社会历史的转型远比“遮蔽”复杂得多。我们有必要追问：历史除了遮蔽之外还发生了什么？戴锦华的“反遮蔽”是否可能形成另一种“遮蔽”？戴锦华以“中产阶级”去想像90年代的大众文化，做出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在我看来，在文化研究早期本土化实践的第一批代表性著作中，聚集起来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有着相近的立场与认知。他们高度关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和趋势，具有非常敏锐的现实感和洞察力，力图参与到社会文化中进行发言。因此，大众文化批判成为他们重新介入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现场的一个重要入口，这是重获阐释与批判现实能力的一种尝试。

第三种代表性观点，是以童庆炳、孙绍振、朱立元等人为代表。这一批学者关注的重点并非“文化研究”本身，而是文化研究带给文学的影响。在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过程之中，一些潜伏已久的观念分歧渐次浮出历史地表：文化研究对文学批评产生了什么影响？怎样理解“文学性”？文化研究是否会造成审美和诗意的再度远离？文化研究及其跨学科思维的蔓延及纵深化不断刷新了文学理论的版图，引发了对文学性、文学经典、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乃至对文艺学学科的全面反思。以童庆炳、孙绍振等一批坚定的“审美主义”学者为代表，他们坚守着文学经典的审美立场。正如布鲁姆所言，“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15]。相对而言，文学研究更加关注文学作品的“内部形式”，关注文学的审美价值、人性书写与情感道德。在他们看来，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存在着一种“难以相容的异质性”，文化研究是“反诗意”的，它可能造成了“审美”的再度远离。童庆炳在对现代性带来的种种文化失范以及“反诗意”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一种文学理论的新格局——“文化诗学”^[16]。孙绍振认为，文化研究比传统的主流文论更不重视艺术

本身的奥秘，从方法论上虽然有进步，但是造成了“审美价值”的撤退^[17]。在他们看来，文化研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对文学研究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因为文化研究转向了审美之外的社会历史、权力运作机制以及符号编码与解码的阐释。这在学界是一种主流性观念，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必须承认，文化研究确实大胆地突破了审美的束缚。无论是逾越传统学科边界而进入跨学科领域，还是逾越传统的文学经典而进入通俗文化，文化研究都试图将自身置于其研究对象所栖身的社会文化网络之中。

第四种代表性观点是将文化研究视为一个“能指”或一种策略，主要以蔡翔、汪晖等为代表。蔡翔说：“接受或部分地接受所谓的‘文化研究’，并不仅仅只有一种知识上的需要，更多的，仍是现实使然，是我在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确立过程中，渴望找到的某种理论资源或者写作范式。因此，在另一种意义上，对我，或者对我的朋友来说，‘文化研究’更多的可能只是一个能指，我们依据这个‘能指’来重新组织我们的叙述，包括对文学的叙述。”对于他而言，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所带来的学术转型可以更为有效地接通其历史记忆，文化研究只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论上的“过渡”：“如果哪一天，‘文化研究’控制或者开始限制我的思考，我想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离开。”^[18]显然，蔡翔等人只是将文化研究当作一种功能性的知识范式、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更多的是出于其自身的现实需求而借用，他们对文化研究的认知往往也带有较强的个人倾向性。

第五种代表性观点，以南帆等人为代表，充分关注与挖掘文化研究阐释“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相较而言，南帆总是力图将问题看得更为复杂一些。从早期的《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到近期的《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挑战与博弈：文化研究、阐释与审美》等文章，他都强调要回到历史现场，考察诸多因素之间的复杂博弈，挖掘文化研究在面对“中国经验”的复杂性。对于大众文化研究，重要的不是做出非此即彼的肯定或否定判断，而是应该根据语境展开具体的分析，辨别出哪些方面呈现为“解放”或者“压抑”。他始终提醒人们：要关注大众文化研究的双重性。在

《挑战与博弈：文化研究、阐释、审美》一文中，他则从关系主义视角考察诸多话语系统之间的“博弈”关系。南帆的理论兴趣大多聚焦于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联性问题，从双重视域到关系主义，他以文化研究的视域敞开了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多维关系。

当然，还存在其它关于文化研究的观点与论述，诸如陶东风、金元浦、周宪、赵勇、周志强、包亚明、罗岗、胡疆锋、周计武等一大批学者关于文化研究的论述，我们无法一一进行全方位概述。相对而言，以上五个方面较全面地涵盖了当前中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性立场与观点。当然，每一种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理论立场的产物，无论这种立场是否被意识到。我们在接受与运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化约地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应该将其放置到历史现场，考察其阐释“中国经验”的有效性与复杂性。因此，回到文化研究接受的历史现场考察诸多学者在接受过程中吸收的理论资源、持有的理论立场以及学术观点就尤为重要。种种观点之间的论辩、交锋与博弈，不仅仅呈现了知识分子参与、介入当下社会的意识与立场，而且有效映射了这个时代的文化症候与思想活力。

四

20世纪以来众多的西方理论竞相登台，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强势介入下，中国文学理论如何与之展开有效的对话？中国文论如何保持民族本色？西方文论能否有效地阐释中国文学？这一系列问题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现今，西方中心主义受到了理性审视，西方各种理论以及现代性话语也遭受了种种质疑。因此，重新审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之关系，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等议题亦再度进入我们的视野。面对当前炙手可热的文化研究，如何看待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之间的关联？不言而喻，文化研究的引入，为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开启了一种崭新的挑战，有力推进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对话与重构。

文化研究的引入，对中国文学批评的范式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传统的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

而言，故事是他们叙述的核心内容，而对主题、人物、情节、审美效果等方面的考察则是他们剖析文学的惯常手法。如在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典型”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经过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新批评”等操练的一大批批评家，他们都围绕着“文本”这一轴心展开字斟句酌的文本分析。从字词的音义到词语的肌理，从语言的质感到叙事张力，从叙事视角到文本的结构，这些都是他们所倾心的研究焦点。如《红楼梦》研究，在引入文化研究之前，研究者们大多聚焦于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贾府的兴衰史、人物命运的刻画、曹雪芹的身世、文本的考据等方面。文化研究引入后，对《红楼梦》的文本解读则敞开了阶级、性别、意识形态等向度，这样的解读显然属于“非美学”的“外部研究”。文化研究学者可能从《红楼梦》中条分缕析出大观园内部的阶级斗争、性别政治与权力，也可能从《红楼梦》的诸多版本的传播解读出符号的增殖。再如莫言研究，文化研究导入之前更多的是从审美维度聚焦于莫言的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生动、叙事技巧以及语言风格、作品意义等方面，而文化研究导入之后，则激发了人们从无意识、阶级、性别、民族国家等方面来切入文本。同时，对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支撑的分析及对其复杂结构的编码与解码亦成为文本解读所热衷的话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来说，文化研究的引入无疑进一步敞开了文学批评的阐释空间。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为了阐释中国文学与文化现象，外来理论与传统本土理论之间必然会展开碰撞与博弈。如前所论，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观念、命题以及思维方式。下文将着重讨论文化研究的引入对中国文学理论原有的概念、观念与体系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同时又拓展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哪些维度。

文化研究盛行之后，首先引发了对“什么是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论边界的重新思考。南帆指出，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的考察，即是“发现文学卷入的种种关系”，如文学与阶级、性别、种族、空间、历史、媒介、意识形态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关系主义的理论视域看，“考察文学隐藏的多种关系也

就是考察文学周围的种种坐标。一般地说,文学周围发现愈多的关系,设立愈多的坐标,文学的定位也就愈加精确。从社会、政治、地域文化到语言、作家恋爱史、版权制度,文学处于众多脉络的环绕之中。每一重关系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改变、修正文学的性质。理论描述的关系网络愈密集,文学呈现的分辨率愈高”^[19]。显然,文化研究观念与问题场域促使传统文学研究的场域发生了新的位移,拓宽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要摆脱原本颇为僵化的教条,探讨新的主题,尤其是那些至今尚未触碰到的主题。文化研究时刻回应着不同情境中变化着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域”,犹如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开展的文化研究以其丰富的形态有力地回应了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女性主义者、拉康学派、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符号学派,这些被布鲁姆称之为“憎恨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分支,它们所集结的众多理论概念和不同的阐释模式其实为我们提供了多向的解读路线。而且,众多理论家持续不断为文化研究制造理论的升级版,为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密度。

文化研究的导入,引发了对性别的重新思考。女性主义的横空出世对文学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文学与性别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神话”。文学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浮出历史地表,二者之间的密切互动被揭示出来了。以往不被关注的性别问题,终于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根据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大量的文学研究作品潜藏着男性中心主义以及对女性的压迫,而为了维护男性中心主义的统治,意识形态则有意遮蔽了文学与性别的关系。女性主义者试图竭力突破“男性的凝视”,打破“伟大的男人创造了历史”的“神话”。这样一种努力突破了意识形态的禁锢。毋庸置疑,女性主义对发展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的批判潜力是极为重要的,它对文学理论的贡献不言而喻。

而后殖民主义的导入,则引发了对民族认同、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重新阐释,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敞开了另一个重要维度。萨义德的《东方学》犹如一声惊雷,推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迅猛崛起。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

“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20]。一系列的理论成果表明,大量的文学作品隐藏着欧洲中心主义以及种族歧视等问题。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破土而出之前,种族问题隐而不彰,以各种形式散见于各种作品之中。当文学与民族的关系被纳入考察视域之时,后殖民理论就将这些散落的信息系谱化了,显示出了极强的理论召唤能力。关于文学与民族的关系考察,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民族不平等论述进而讨论到了文化身份问题、被殖民者话语研究、第三世界文学以及主体性问题,等等。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它打开了文学与民族长久以来被遮蔽的向度,恢复了文学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增扩了文学理论的阐释空间。

大众传媒是文化研究游刃有余的另一个重要场域。某种程度而言,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与媒介研究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但我们不能过于轻巧地将二者画上等号。从威廉斯的“电视与文化形式”到霍尔的“编码/解码”,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到莫利的“能动的受众”,媒介研究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然而,在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之中,媒介传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文化研究的介入使我们充分意识到了大众媒介及其受众的重要性。“分析媒介”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围绕它可展开情势研究,分析媒介生产和媒介有效性的复杂话语,或以媒介符号去阐释情节、事件、类型、位置、形式等,研究空间极大。当前强势兴起的网络文学,更是以“市场”“流量”“点击率”“资本运作”等另一套观念与话语建构起了网络文学与大众文化研究的话语体系。

文化研究出现后,人们不再视文学为一个“纯审美”的殿堂。文化研究的介入,为文学理论、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带来了持续的震撼,随着“新的视域”的开启,人们解放乃至制造了种种文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悄悄地重新联结了文学与社会各种复杂的关系,促使文学理论话语不断适时而变,进行必要的新的话语体系重构。

五

现在,确实应该认真审视“重建中国当代文论

话语体系”了。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时期以来，关于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讨论十分活跃，经历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发展阶段。诚如童庆炳所言：“文学理论作为学科建设，我一直觉得应在中、西、古、今四个主体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互通有无，互相补充，互构互动，互相发明，既借鉴西方的有益的观点，又不失中国民族之地位。当文学理论能利用历史留给我们的全部资源的时候，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就可以获得成功。”^[21]在与文化研究进行持续“对话”的过程中，文化研究提供的经验与启示值得我们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使之融入到我们所重构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之中。

首先，文化研究重新激活了重建中国文论的危机意识。无论是将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学科也好，一种研究方法也罢，“文化研究确实对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正统提出了激进的挑战。它促进跨越学科的界限，也重新建立我们认识方式的框架，让我们确认‘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和重要性”^[22]。这也正是文化研究的魅力与精髓所在。一方面，文化研究通过具体的问题呈现了现代世界本身的危机状况；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产物的文化研究，通过强烈的批判精神创造一种“危机意识”并推动人们改造世界的勇气与动力^[23]。事实上，今天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也面临着结构性困境的问题，面临着“双重悖论”。要保持文化研究的活力与批判性，必然要不断地召唤与激活其危机意识，这样才能持续地对社会问题的结构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批判。援引詹姆逊的说法，源于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本身为我们提供了探照文化研究的“认知测绘图”。文化研究摆脱了既有的僵硬轴线，不断激活危机意识，唤起我们对未来新的希冀。这是文化研究必须永远坚持的方向。

其次，文化研究提升了文学理论的实践品格，促使了文学理论与社会学的再度结合。

文化研究特别注重实践性，这对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真正活力，在于进入当代社会，介入与回应社会历史的巨变，发现并解决问题。“文化研究事业将文化重新纳入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当中，重新

融入生活方式之中，重新融入社会形态的整体性之中。”^[24]文化研究有助于文学理论与社会学再度结合，使得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能够有效地与当前的社会现实紧密互动。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品格和跨学科优势让文学理论研究找到了新的突围方向，而文化研究的开放性旨趣和批判性精神则让文学理论研究增强了面向现实的勇气和力量。

再次，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应该直面“中国经验”，有效把握“中国经验”，恰当表达“中国经验”，合理阐释“中国经验”。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有两种典型的路径：一是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二是“学步西方”的全盘西化。历史实践已然证明二者都不可靠。那么，中国当代文论话语构建的方向何在？直面“中国经验”无疑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点。当然，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其建构也并非只是一堆概念、一批论著的堆积所能完成的，更为关键的是这个话语体系建构之后所具备的阐释效应。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有必要对其进行批判性辨析，考察其对于“中国问题”阐释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重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需要“中国经验”的有力支撑与话语表述，必须在话语光谱中找到自己的对话对象。

最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应该坚持“历史化”的思维，做到詹姆逊所宣称的“永远历史化”，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其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建一套宏大的理论话语或者一座概念的殿堂，而是希冀不仅能够有效地阐释与回应具体文本及文学史，而且力图进入更大的文化场域，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中与政治、经济、历史、科学、传播、地理等诸多话语类型展开对话与博弈。一种理论或一套话语体系在新的文化场域中能否获得新的生命力，是否具有阐释能力，是由各种复杂因素的相互角力与博弈所决定的。历史并未预设一个标准的模式，我们必须根据自己所置身的具体历史语境做出自己的判断。当然，我们的观点、概念以及建构的范式都将汇入庞大的历史文化网络之中。正如霍尔所宣称的那样，回到话语聚合的历史情境，才能恢复其

历史面貌，才能激活其生命力。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重建工作亦必须在历史的持续变动中进行。

置身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退缩在一个封闭的牢笼，而应该以平等对话的方式把握理论的张力。直面文化研究的挑战，在对话中甄别、吸收与重构，才能使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未来获取更多的可能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研究——理论旅行与本土化实践研究”（批准号14CZW007）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孟登迎译，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4辑，第303—30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第5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

[3] 转引自本·卡林顿：《解构主义：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孟登迎译，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第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 参阅詹姆斯：《詹姆斯文集》第3卷，第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杰夫·刘易斯：《文化研究基础理论》，郭镇之等译，第15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马海良译，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第40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8] 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9] 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代前言），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第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10] 南帆：《先锋的多重影像》，第214页，现代出版

社2017年版。

[11] 陈光兴主编：《文化研究在台湾》，第19页，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版。

[12] 涉及文化研究的一系列丛书陆续推出，主要有：王逢振和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共同主编推出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共26种；周宪、许钧主编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张一兵等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王逢振主编的“先锋译丛”等。

[13] 王晓明：《在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与文学分析》，第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6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第8、20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16] [21] 童庆炳：《代前言——我的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之旅》，《童庆炳文集》第1卷，第15页，第1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7] 孙绍振：《文学解读基础——孙绍振课堂讲演录》，第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18] 蔡翔：《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蔡翔卷》，第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 南帆：《表述与意义生产》，第301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0]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第6页、第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22] 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第298页，亚台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

[23] 参见周志强：《紧迫性幻觉与文化研究的未来——近30年中国大陆之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5期。

[24]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庄鹏涛等译，第17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